

板本研究

說古籍圖錄

--兼商榷《武漢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圖錄》若干版本

郭明芳*

所謂「古籍圖錄」，顧名思義，即是以古籍為主的書影集。「圖」者古籍書影，「錄」則為簡要文字說明。這裡所謂簡要文字說明，蓋指對於圖錄所選書籍的基本資料，如書名、卷數、編(作)者、版式行款等。這裡的說明不宜如書志一般有太多文字，蓋圖錄重點在圖非錄。若以錄為主則應改撰書志為宜。一般所見圖錄或名圖錄、或名書影，或名留真，不一而足。

筆者將古籍圖錄蓋分為四種形式：一是一般的館藏特藏圖錄，亦即精選館藏書影彙為一編。這種類型圖錄比較常見。二是館藏專題圖錄，此類館藏專題圖錄與前項稍有不同。前者所收是館藏具普遍性，後者則是館藏具特殊性圖書，例如說臺北國圖曾出版《希古右文：1940-1941 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¹即是以該館館藏抗戰期間透過文獻保存同志會在敵後上海搶購的古籍圖錄。又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曾編輯出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圖錄》²。第三種屬於非館藏圖錄，或為編者收集同類書影編輯而成，如趙萬里編《中國版刻圖錄》³、黃永年《清代版刻圖錄》⁴等，或近年吳希賢《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⁵與沈津、卞東波編《日本漢籍圖錄》⁶等。另一種則是近十幾年來古籍拍賣所出版的圖錄。此類圖錄多半一年春秋拍二期，且以贈送買家為主，印刷精美，各館收藏多未能全備。

圖錄的發展也是近一百多年來的事。而古來或有藏書家、刻書家以影刻方式出版書籍，但此種影刻方式並非百分百與原刻書籍一樣，仍有誤差。再者，這些影刻書籍也只是刻印一整部書，少有類似書影集情形。最早的古籍圖錄乃在攝影技術發展後，以攝影方式製作而成，如楊守敬《留真譜》。楊氏曾出使日本，收購不少已不見中土流傳的漢籍，並編輯出版為《古逸叢書》，另外他也就所見珍貴古籍，以影刻方式，擇古書一至數葉製作《留真譜》與

* 東吳大學中研所博士班

¹ 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13年4月。

² 北京市：中華書局，2014年5月。

³ 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0年。

⁴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

⁵ 北京市：中國書店，2003年10月。

⁶ 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3月。

《續留真譜》。這種以影刻方式製作的圖錄，雖無法反映原書細緻，如所收有《活人事證方》即與原刻有相當落差，但楊氏此舉存其真，亦足稱頌。

民國時期，藏書家或公共圖書館亦有出版圖錄，嘉業堂、鐵琴銅劍樓、陶湘涉園與南京圖書館等。這些書影圖錄今日北京圖書館均有影印收入《珍稀古籍書影叢刊》。而潘景鄭、顧廷龍兩先生所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則是圖錄發展重要一部著作。是書選擇明代重要版刻，分門別類，以一圖一說明方式出版，大量印行，頗有助於學者。

1949 年以後，兩岸亦有不少圖錄出版，如上海圖書館《善本書影》。沈津〈談善本書影〉一篇對該書影集編輯過程、所收書籍言之甚詳，並言書影功用云：

實際上，編輯《書影》的目的，可見此書之後記：「通過實踐，我們感到對於初次參加編目工作的同志，在版本著錄方面最好能提供實例，參証對比，有所借鑒。為此，從我館藏書中找出宋、元、明、清刻本和抄、校、稿本共三十種，略具簡說，彙編書影，以應急需。」⁷「以應急需」這句話，是指在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領導下，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和大專院校圖書館的古籍整理和編輯工作已迅速開展，但有不少參與者過去沒有和古籍版本打過交道，不熟悉古籍版本的鑒定，所以才會編輯此《書影》。⁷

又趙萬里或黃永年等人亦就專藏、專題編有書影圖錄。至今仍為研治版本、整理古籍重要參考材料。臺灣方面，亦有公共館出版圖錄，如國立中央圖書館(今臺北國圖)的《宋本圖錄》、《金元本圖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宋本圖錄》等出版。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科技突飛猛晉，攝影掃描技術更見精細，製作的圖錄已非昔日能比，更能呈現古籍真貌。

除此之外，尚有另類圖錄，亦即拆散不同原書，再裝訂成冊者。此類「真」圖錄，不僅能反映古書真貌，從版式行款、刻字細節，而致於紙張情形，一一呈現，但亦因此類書影集乃拆真書散葉，頗為難求，更顯其珍貴。此類書影集最早為蘇州文學山房主人江靜瀾父子整理舊書時，將各種圖書散葉拆下，另裝訂成冊，編為《文學山房明刻集錦初編》。其後，亦有不少仿製，筆者曾見過幾種。

圖錄的主角是書影，文字僅是輔助角色，不宜過多，否則喧賓奪主，既

⁷ 引見氏著《書叢老蠹魚》(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1 年 1 月)，頁 279。

非書志，圖錄之名亦不符合。而文字說明應如何拿捏？筆者認為應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每書著錄內容即已足，至多再加上是否有後人題記或鈐印註記，如欲以大量文字敘述，則宜以書志形式為之。

古籍書志與圖錄在古籍整理是一體兩面，缺一不可。蓋書志為文字敘述一部古籍種種情形，包括版刻時代、作者、撰作意旨與遞藏等等，而文字有時而窮，透過圖錄的編纂，以實際書影輔助書志，兩兩相得益彰。或謂書志已有書影何必需要圖錄。書志在有限空間很難每一部書都能放上大而清晰書影，如遇到一書特殊情形，需要二至三幅書影，則就無法照辦。這也是筆者以為書志與圖錄相同重要的原因。

書影的選擇，筆者認為有幾項原則：首先是**基本原則**。書影必須以某書卷端葉面為基本，若是殘本則應以該書最前一卷卷端，如某書存卷五至十二，其卷端書影就應該是卷五卷端。其次則是**變通原則**，舉凡一書扉葉、牌記或足以顯示版本、流傳(主要是印記、題記)或該書在某學科特殊價值葉面均應放入。

編纂書志的典藏單位必須再編纂圖錄以輔助，當然尚未編纂書志者，透過圖錄先行亦無不可。筆者所見書志與圖錄並行的例子，即前些時候北京大學圖書館購得日本大倉文庫古籍，隨即編成書志與圖錄。

再說，圖錄既以書影為主角，則應以大圖、解析度精緻為佳。例如說《首都圖書館藏國家古籍珍貴圖錄》⁸一書，書影並非每幅皆大圖，且文字敘述過多似書志。

書影選圖部份，一律以首冊首卷卷端為主，如有需要，則可附上同書其他書影，如後人題記、扉葉、牌記或其他有助於顯示出本館藏特殊性葉面。另外，編排上，如有同時代但不同版刻之書應並列，以為讀者可藉此判別版刻異同。

筆者試舉一例以為說明。例如說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重修兩浙離志》。



⁸ 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

《重修兩浙齋志》二十四卷二函 王圻編 崇禎間刊本 單欄 每半葉九行廿字 版心白口 單黑魚尾 魚尾下記卷數、葉次 今書少見流傳

古籍書影圖錄功用，除有助學習版本鑑定外，筆者歸納有以下三項：

一、**鑑賞品評古書**。今日製作圖錄環境比起過去，更能細緻反映古書情形，因此古籍拍賣，或館藏圖錄，亦能作為鑑賞古書之用。

二、**學習古籍版本**。吾人學習古籍版本學要件是有大量可供實踐材料。這樣的條件在古代多是藏書家，在今日古籍多收歸公館，公共館從業人員理應有機會透過館藏實踐。至於一般讀者，或僅能透過館藏調閱方式為之。吾人透過各種圖錄亦能得到相同效果。由今日各種圖錄透過高倍率掃描，加上印刷精美，幾乎與原件無異。尤其是圖錄中如有類似版本，相互比對，即能獲知兩版式否為同版前後刷印，抑或原刻與翻刻之差別。當然這樣比對的訓練是版本鑑定的基礎功夫，猶記得筆者初習版本之學亦是利用此法。

三、**提供他館借鑑**。專題圖錄或一館館藏圖錄的出版可提供他館整理館藏時參考。圖錄中列版本與本館所藏是否相同，如相同，圖錄著錄是否合於事實；如不同，孰者為先，孰者為後，其相互關係又如何，如此對於館藏版本判斷當有更明確依據。陳先行在所著《古籍善本》中亦強調圖錄之必要，他說：「版本學界專門研究考訂明代版本的並不多，不少版本甚至是較有名的版本，是初印還是後印，是原刻抑或翻刻，人們並不清楚。常在拍賣市場上看到將後印本當初印本、翻刻本當原刻本拍賣的情況；有的公藏目錄同樣也著錄錯誤，因此缺乏版本比對資料，確實難以把握。可見，編纂圖錄有其必要性。」(頁 125)雖說書目、書志亦有異曲同工之效，但書目、書志僅提供文字敘述，對於內文文字、版式行款細緻情形非圖則無以進一步確認之故。這類情形以原刻、翻刻情形為常見。翻刻本其版式行款或同於原刻，未加以進行細部經眼，或誤翻刻為原刻，或誤原刻為翻刻。

例如說明嘉靖三年徐煇刊本《唐文粹》與翻刻本的判別即是一例。原刊與翻刻極為近似，故多皆視為嘉靖三年徐煇刊本。事實上，兩本實有不同。原刊本版心下見有刻工，翻刻本則無刻工。且內文文字有微異。而最重要的判定依據乃在於流傳至今，存量之多寡。嘉靖三年徐煇刊本為家刻本，流傳至今理應不多，翻刻本則為書肆所翻刻，量大，故流傳至今較多。筆者曾就此查檢各館館藏，有刻工者與無刻工者約有 1：4 之差。

筆者近得閱《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圖錄》⁹(下或簡稱「《圖錄》」)，對該館編纂館藏善本圖錄用心甚為感佩，然其內容或有值得再商榷處，現借此文一角，以為說明。

武漢大學歷史可追溯至 1893 年，至民國年間藏書已有 40 萬冊之多。其所典藏古籍近 2 萬種、20 萬冊件，善本則有 931 種、14,047 冊，其中 66 種入選國家珍貴古籍。此《圖錄》則是在館藏書目編纂出版前，先行選擇 166 種善本編輯而成。該館編纂《圖錄》時，也對舊有著錄作了考訂，期能更完善揭示館藏。

《圖錄》有幾點可稱許，其一所製作書影解析度高於學苑汲古網站。其二將同類書，不分是否副本並排。此部僅可提供讀者審定，對於同書文字異同情形，如前後版、原刻翻刻比對更有幫助。《圖錄》頁 32-33 分別為元刊明遞修本與明萬曆南監刊《隋書》，正好可看兩版異同。又如頁 51-52 龔雷刻本《鮑刻國策》兩種為前後印本，亦可透過書影比對。

更甚者，對於此可糾正過往著錄遇到問題點。又如頁 140-141《分類補注李太白詩》提供該館典藏兩種版本：玉几山人與六經堂。兩版幾乎一模一樣，六經堂版甚至刻上玉几山人字樣，若無同樣兩種書影，六經堂或誤為玉几山人。按，六經堂本版心無刻工著錄。

而透過圖錄出版亦能引發眾人對館藏古籍版本質疑，達到對某版本真正認識。筆者現就閱讀《圖錄》對若干版本判定提出質疑。

頁 15《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並五音類聚四聲篇》十五卷，著錄「明正德十一(1516)年刊本」。而於「學苑汲古」資料庫則作「明成化七(1471)年釋文儒等刊本」。「正德刊」說法應是該館改訂後的版本。此書於明代有多次翻印，而此本應是「內府司禮監刊本」，蓋是書刻印精良，且版心下緣有「印綬監太監商忠」字。(見附圖¹⁰)

頁 18《後漢書》著錄「崇禎十六(1643)年毛氏汲古閣刊本」。於《圖錄》所提供書影有藍色紙廠印記，館藏本或應改作「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刊清印本」為宜。

⁹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年 6 月。

¹⁰ 按，本文有關武漢大學藏本書影皆取自學苑汲古資料庫。



頁 43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圖錄》卷端書影鈐「廣運之寶」當為偽印。蓋此書非明內府所刊印，不可能鈐蓋「廣運之寶」，且此印與真印有差。按，此亦見該館館員吳芹芳著《中國古代的藏書印》。又復旦大學館著錄「明內府刊本」，亦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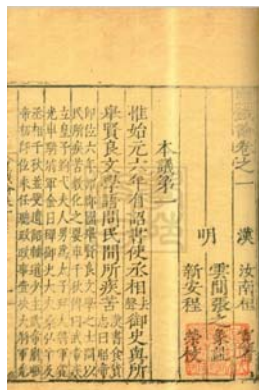
頁 81 《洛陽伽藍記》著錄「明末毛氏綠君亭刻本」，此本實為毛氏《津逮秘書》零種。

頁 84 《籌海圖編》著錄「明嘉靖四十一(1562)年胡宗憲刻本」，實應改為「明嘉靖四十一(1562)年浙江杭州官府刊本」為宜。

頁 89 《鹽鐵論》十二卷著錄「明嘉靖三十二(1553)年張之象刻本」。卷端書影作者項第三列有「新安程榮校」。故知此本當為程榮《漢魏叢書》零種。



臺北國圖藏張之象刻本



武漢大學藏程榮校本

頁 103《術數記遺》一卷，著錄「北朝周甄鸞注、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六年抄本」。按，此書原書作者題「漢徐岳撰」似有不合。再此題乾隆卅七至四十六年抄本亦有問題。此書卷端題「欽定四庫全書」，應是《四庫》完成後，民間人士所傳抄，其時間應晚於乾隆年間。而其「翰林院典□廳關防」不僅不合官制，且印文極為粗糙，疑為偽印。此書有可能是清末民初所抄。

頁 109《唐宋白孔六帖》著錄「明刻本」，此本下有刻工，與玉几山人《集注杜工部詩集》，多有相近，據此可以確知此本當嘉靖間蘇州所刊。故應該為「明嘉靖蘇州覆宋刊本」。

頁 116《錦繡萬花谷》著錄「明嘉靖十五年秦汴繡石書堂刻本」。書影版心上方無題「繡石書堂刊」字樣，應是以他本配補。按，以筆者所知《錦繡萬花谷》除秦汴繡石書堂刊本外，尚有兩種刊本，極為相似。



哈佛燕京(左)、臺北國圖(右)藏本書影

頁 133《中州集》十卷首一卷附《中州樂府》一卷，著錄「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毛氏刊本有初印與後印兩種，初印本無《中州樂府》一卷，後印本方補之，故此本應作「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後印本」。按，毛氏《中州樂府》跋：「家藏《中州集》十卷，逸其《樂府》，梓人告成，殊怏怏然。既得《樂府》一帙，乃九峰書院刻本也，不勝劍合之喜。」筆者曾見過初印本，印刷精良，後印本則略顯漫漶。

本文對古籍圖錄作一簡要是概述，並對圖錄功用提出一些想法。對於圖錄，筆者認為各館應積極從事，一以在書目、書志出版前，編纂圖錄提供讀者或研究者更多關於館藏古籍訊息，二則可藉由出版，對館藏古籍版本重新界定，尤其是出版後，能有更多專家學者提出新的見解，彌補館藏判定上的盲點。三則若書志先行，圖錄則有輔翼，反之則可作為書志撰寫的前哨。